

农民工当选全总副主席的意义

潘洪其

今日论语

17日闭幕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届执委会第四次全会上,中铁电气化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巨晓林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巨晓林家住陕西省岐山县祝家庄镇杜城村谢家堡组,他以农民工身份当选为全总副主席,是迄今农民工参加工会组织达到的“最高级”。

农民工首次当选全总副主席,具有重大而鲜明的标杆意义。首先应该说,巨晓林不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他经过不断学习刻苦钻研,创新了43项施工方法,创造直接经济效益600多万元,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

多项荣誉,并被选为中共十八大代表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现在他当选全总副主席,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承担更多责任,对工会组织和他人而言,都是再合适不过的。

其次要看到,巨晓林虽已成为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并有多种荣誉、光环加身,但他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在所供职的央企中尚不是“正式职工”,而只具有相对边缘的农民工身份,因此他在全中国亿万农民工当中具有高度代表性。他在当选全总副主席后,不像专职副主席那样成为副部级领导干部,而仍在基层一线从事技术工作。他以农民工身份行使全总副主席(兼职)的职权,有利于更好地关注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和权益保护,积极反映广大农

民工合理诉求,推动工会组织做好维护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

巨晓林当选全总副主席,体现了工会组织改进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更多把普通群众中的优秀人物纳入组织,明显提高基层一线人员比例的改革方向,显示了全总改革克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的切实努力。工会组织要更好地团结、服务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更好地支持、帮助广大职工依法维护权益,就要大力推进去机关化、去行政化改革,使工会组织作为“职工自己的组织”的职能定位更加明确,作为“职工娘家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为此,工会组织需要把普通职工中的优秀人物源源不断纳入“彀中”,使他们在工会领导机

构中履行更多职责,发挥更大作用,有效维护职工公平就业、同工同酬、工资谈判、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

毋庸讳言,当前农民工仍然是从农民向工人“过渡”的一种尴尬身份,他们的权益基础相对薄弱,权益受损的可能性较大,维权意识和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更需要获得工会组织的服务与保障,需要更多巨晓林式的优秀农民工为他们代言。随着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民工和工人身份也要逐步实现一体化,巨晓林们在工会组织中为农民工保障发力,工会组织支持农民工维护公平就业、同工同酬等合法权益,最终就是要帮助农民工走出“过渡”的尴尬,成为各类企业中名副其实的“正式职工”。

新民随笔

戴口罩

卫蔚

近来,流感高发,地铁、商场、办公室里,咳嗽声不断,口罩又成了“热门单品”。

我戴口罩的意识大概可以追溯到2001年去香港探亲。亲戚陪我们逛街,因为感冒十分自然地戴上了口罩,让我深以为然。回了上海,不幸感冒,自然效仿。不过彼时戴着N9搭乘地铁,是要冒着被别人不时用眼角余光围观的压力的。2003年SARS后,戴口罩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可惜,时至今日,这个利人利己的好习惯仍未普及。我虽没有洁癖,但对身边毫无遮拦的猛咳,不免有些抵触:挤站在沙丁鱼罐头似的地铁车厢里,身边不期然响起咳嗽声,气流有节奏地冲击着后脖、面颊甚至头顶,浑身汗毛直竖。这状况,我不止一次遇到过,但都咬牙隐忍了,最多是转头斜眼以示抗议,心中只盼我或者他早点到站。当然,也有暴躁脾气者不愿忍受、拔拳相向。几年前,北方某城市两名女白领在乘坐公交车时,因为其中一人的几声咳嗽而引发了一场“恶斗”。两人在公交车上大打出手,还进了派出所,伤人的被行政处罚,受伤的则休养了数月。当时那咳嗽的人,要是戴了个口罩,就能避免一场风波。

戴口罩,本质上是一种卫生习惯。通常认为,19世纪末,德国的一位医生发明了口罩。他发现动手术时呼吸或说话,容易使病人的伤口感染。于是,他用一块纱布蒙住口鼻,果然大大降低了伤口感染率,从此便有了口罩。也有专家认为,是中国最早发明了口罩。元朝初叶,马可·波罗来华看到中国人使用“口罩”的情形:“在宫廷里,那些侍奉皇帝饮食的人,口与鼻一律都要蒙上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巾,使他们所发出的气息,不致传到皇帝的食物上去。”

戴口罩,是尊重他人的行为。大家即使不知道一次咳嗽会产生3000个微小飞沫,但都晓得感冒时咳嗽喷出的飞沫包含着细菌、病毒。地铁那么挤,人与人距离那么近,推己及人,感冒了戴个口罩,是对他人应有的尊重,体现了社会公德。

劝人也劝己。为了自我保护,我已经养成了感冒出行戴口罩的习惯,你呢?

莫让杂音侵蚀了反腐“获得感”

权威声音

的切身利益,才能防止30多年改革成果付诸东流,这一正风反腐的“大逻辑”,需要反复申说。

也要看到,部分群众认为“反腐与群众利益无关”,某种程度上是问题的反映,是责任传导不到位

造成的。有些地方,吃拿卡要没有了,但变相的刁难出现了;一些领导干部嘴上喊得响了,却迟迟不见行动。对此,应该做的不是降低正风反腐的力度,而是恰恰相反。(白龙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新民新语

45岁的少女

孙佳音

性感的长腿,好看的皮靴,轻薄的衣服,还有大大的蝴蝶翅膀。上周六跟17岁时就认识的姑娘一道去看莫文蔚的演唱会,那年夏天唱着阴阴郁郁哀伤情歌的小女人,十几年过去,却在辐射的光影里蹦跳。尤其,她肩头那一双蝴蝶的翅膀,实在是少女大梦幻了一点。

在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感叹,青春真好啊。回过神一想,莫文蔚出道那么些年,好像已经四十有五。原来,“年近半百”的徐娘也可以这样有自信的光彩,这样像一个少女,站在红红绿绿的灯光和漫天纸屑里,一点都不突兀。再一次叫我重新感叹,青春真好啊。

就像莫文蔚这样。她把自己的这次巡演起名“看看世界”,因为去年她停工三个月,跟她17岁时候的恋人,一起去看了看世界。她的个人微博里,那些奇绝的地貌,那些旖旎的风光,还有那些自信的明亮的笑容,都叫人想为她鼓掌。喔,还有那个17岁的恋人,他们分开,后来又再重逢,如今已经是夫妻。

讲到婚姻,上个周末又有人咋呼着王菲谢霆锋大婚。虽然很快被证实是又一次假新闻,但想起来每每聊起王菲的这段情,好多人,无论男女都会略带一些调侃的语调说,“厉害哟三个孩子三个爹”。我知道他们都羡慕王菲的“妇道”。天后自然任性很跳脱,但我还是记得很久以前,当有记者委婉地问她,你想过给窦靖童找一个爸爸吗?结果王菲想也没想,很直白地回答说,“我找的是我的伴,她自己有爸爸啊”。说的多敞亮,多好。

说起孩子,不得不聊聊这几日,铺满朋友圈的中科院博士孕妇惨死事件。据说,在放弃上一胎并索赔成功的这五年里,他们一家人孜孜以求的,就只有怀孕。结果,这次除了先兆子痫,这位博士孕妇还碰上了可怕的动脉夹层——发病率十万分之一。医闹与否或者赔偿多少,且留给法律。但让我难过的是,一个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在明知身体无力负担怀孕的情况下,那么执拗地怀孕,那么执拗地想要保住这个男孩。是的,在她丈夫的自述里,这是“未出生的儿”,而被他们放弃的上一胎,只是“女婴”。

又想起来舞台中央那个45岁的少女。

有些人认为,反腐败和群众利益无关。持这种论调者认为,反腐只是“高层政治”,对群众切身利益没有增进。这种说法割裂了反腐败斗争和人民群众的有机联系,没有看到正风反腐背后的政治逻辑和人心期待。

反腐败斗争成效如何,从社会风气的变迁中就能窥见一斑。而最有说服力的感受,来自那些经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企业和个人:原来需要半年的审批,不到一个月就下来了;到窗口单位办事,工作人员不再“冷冰冰”;“托关系、找路子”不再成为烦恼……中国社会几年来的变化,让群众感到便利舒心的举措,有哪一件和正风反腐无关?

改革事业始终是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一最大利益不是一小部分人的发财致富,更不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谋取不义之财,而是让所有人都能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确保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事业扫除各种利益藩篱、破冰前行,离不开一支风清气正、勇于担当的干部队伍,必须依法正风反腐。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守护广大人民群众



“手机女友”

“信息时代新生活,游戏聊天着了魔。女友暴怒提分手,娶部手机一起过。”长春的王先生在跟女友几次约会中,吃饭、看电影、聊天,全程都不离开手机,女友终于忍不住提出分手,让他以后跟手机过日子。

曹一画

自由谭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呼应曹雷关于建立译制片纪念馆的动议。这个动议,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上世纪末,因为老伴生病,我一个人无力照顾,遂投奔了杭州女儿家,就此脱离了上海的配音圈子。有一次,从杭州回上海,与作家蒋丽萍女士同乘一辆车。她问我:“译制片现在还有吗?”这真使我不胜惊诧。

想当年——上世纪七十年代,上译厂的影片受到观众何等追捧!谁要拥有两张永嘉路383号的电影票,都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而今,竟然沦落到如此被人遗忘的地步。2000年老伴去世,2003年我回到上海。有一次,听一位影院经理说:“到我们这里来看电影的都是白领,他们要看原版。我们从来不放译制片。”电视里采访年轻的电影观众,他们也说:“译制片是给没文化的乡下人看的,是给老头老太看的。”

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上译粉丝?

苏秀

所以,2005年,我的书《我的配音生涯》(文汇版)在上海书展签售的时候,我惊讶地看到大厅里挤满了人,队伍从大厅绕到楼梯上,再从楼上绕下来。我完全没想到,有这么多少上译粉丝来买我的书。这也鼓舞了我,给了我制作《我的配音生涯》有声版《余音袅袅》的动力。特别使我感到欣慰的是,2011年在上海影城签售MP3《余音袅袅》,来的大多数竟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四百张碟被一抢而空,放在网上的三百张也瞬间售罄。原来,喜欢译制片的,并非只有老头和老太。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由魔笛文化制作的一台演出《辉煌年代》,回顾上译厂几十年的成就,请了我厂还健在的老配音演员——赵慎之、苏秀、童自荣、曹雷、刘广宁、程晓

桦、戴学庐、孙渝烽等,平均年龄78岁。我曾担心,谁会愿意花四五百元来看这帮老头老太?可是,北京国家大剧院竟然座无虚席。我们出场的时候,不但有热烈的掌声,甚至还伴随着尖叫。说实话,我们的节目并不精彩。观众爱的是我们配音的译制片,只因几乎见不到幕后的我们,有一种神秘感吧。由于北京演出的成功,魔笛文化决定在上海再做一台。上海大剧院有上千个座位,仍然一票难求。

这样一来,早已卖断的《我的配音生涯》得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余音袅袅》也由读库改为CD,重新包装出版。我的终极版新书发布会“苏秀下午茶”,不但有多年战友——译制厂的伙伴,和我在上海电视台海外影视的合作

者黄其、小辰、晨光、张欢、刘家祯等前来助阵,上海文化界的诸多朋友刘绪源、周克希、陈钢、毛尖、许朋乐也应邀光临,当然还有一直不离不弃,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上译粉丝,令我感到不胜荣幸。

人群中,我说:“我们的影迷平时隐藏在人群里,你无法辨别谁是我们的上译粉丝。而当有机会表现时,他们就像逢到好雨的秧苗,一下子从地里钻出来,绿油油一大片。”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我无法估算。我只知道,这一切,全缘于他们对上译译制片的一往情深、念念不忘。不唯上海影迷如此,还有全国各地甚至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影迷。

所以,我相信,如果能在永嘉路383号建一座纪念馆,一定会使上译粉丝不惜工本前来“朝圣”。